



清华经济史论丛
主编 李伯重 龙登高

中国经济史探索

陈争平文集



陈争平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清华经济史论丛
主编 李伯重 龙登高

中国经济史探索

陈争平文集



陈争平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史探索：陈争平文集/陈争平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 - 7 - 308 - 10895 - 9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中国经济史 - 文集
IV. ①F12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7348 号

中国经济史探索：陈争平文集

陈争平 著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周元君 刘逸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94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10895 - 9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总 序

清华大学经济史学科的重建始于 20 世纪末。在清华大学“振兴文科”的部署中，李伯重、陈争平、秦晖、高淑娟、龙登高、仲伟民等经济史学者相继被引进清华园，组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学术团队，并于 21 世纪之初，建立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晚近，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作为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优秀人才加盟清华，在清华建立“清华大学市场与社会研究中心”，推动经济史、金融史、社会史等基础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在龙登高教授的主持下，经济史学科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合作创建“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书写古今货殖列传。因此到了今日，清华大学的经济史学科已颇具规模，成为我国经济史研究的重镇之一。

清华经济史学科注重国际视野，立足学术前沿，在浙江大学出版社的积极支持下，主编有“社会经济史译丛”，将一批国际经济史学家的力作及时译成中文出版，反响良好。学科还与《中国社会科学报》合作开辟“海外学潭·经济史”专栏，介绍国际名家、名篇。

清华经济史学科创建的多种经济史研究与交流平台还包括“清华经济史论坛”，专门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特别是海外学人）来介绍其最新研究成果或国际学术动态；每年主办或合作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举办“清华—北大经济史沙龙”，随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加盟，四方联合展开学术交流与争鸣。

这些学术平台推进了清华经济史学科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为

了集中体现学科成果，21 世纪之初出版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丛书”，今简化为“清华经济史丛书”。除了继续推出清华经济史学者的力作之外，也将上述学术活动与平台的成果结集为书出版。为了重振清华经济史学科，发扬光大清华前贤的传统，丛书亦将清华园走出去的当代经济史大师的成果整理出版，这些成果包括 20 世纪国内经济史研究领军学人张荫麟、梁方仲、严中平、吴承明，在海外学界发展的何炳棣、杨联陞等，及在清华从事与经济史相关研究的大家如梁启超、张岱年等。此外，清华经济史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者，这些后起之秀的出色成果，也将精选出版以展现学科发展的未来希望。

清华经济史论丛

2012 年 8 月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丛书

出版缘起

中国今日的经济奇迹是 20 世纪世界上所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只有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奇迹。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近几十年来也成了国际中国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

清华大学在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张荫麟、梁方仲、严中平、杨联陞、何炳棣、吴承明等几位在 20 世纪国际中国经济史坛上最著名的学者，都是清华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因此可以说，清华大学与中国经济史学有一种特殊的缘分。近年来，清华大学引进了一批中国经济史研究人才，他们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和教学方面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并且积极活跃于国内外中国经济史坛，使得清华大学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近期成立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标志着这个学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反映清华大学学者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与教学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我们决定出版这套“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丛书”。入选的著作都经过严格挑选，可以说代表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现今所达到的水平。这套丛书将继续出版下去，动态地反映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成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不断进步、走向辉煌的历史见证。我们相信，随着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精品出现在这套丛书中。同时我们也衷心希望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宝贵的批评和指教，帮助我们做好这套丛书。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

2002 年 5 月

自序

按浙江大学出版社要求，“序”的内容包括作者的学术历程以及此书编排的相关说明。我想，关于学术历程还是我自己更了解，自己写“序”较好。

回顾我的学术历程，可以说尽管我遇上了好时代，但因本人强调独立思考，常常质疑老师或领导的观点，仍难以避免“跌撞成长”。曾有年轻同仁问我：“您也曾走麦城？”我笑答：“我是老麦城了。”时至浙江大学出版社筹备本文集，我刚好60岁，这按过去的说法是我已步入花甲之年，按现在大多数人的寿命情况也意味着我已步入人生之秋。我们那里农民把夏季的收获称之为“小熟”，把秋季的收获称之为“大熟”。可以说，这本文集是我“小熟”的作文选集。我期待着自己能再活一二十年，完成自己很想做的研究计划，能有学术上的“大熟”。

我将要完成的研究计划里包括写一部名为《黄海之滨大年轮：江苏沿海经济发展史》的专著，我本人的经济史探索历程似乎应从黄海之滨“大年轮”说起。1965年春节，我父亲从武进回南京与家人团聚。他询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后，兴奋地讲起中央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决定，并对我讲起了家史。作为一个老新四军战士、老党员，我父亲讲家史时却没有追随当时流行的批判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的风气，而是告诉我：祖父出生于崇明县农家，年轻时因家贫地少生计困难曾过江到实业家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做工，通过参加苏北盐垦事业使家庭生活得到了改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说张謇和通海垦牧公

司。父亲认为张謇虽然是资本家，但他兴办的近代盐垦事业为中国增添了近1 000万亩的耕地，利国利民，他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先驱。父亲的这番话，对我以后研究张謇，研究大生系统企业史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70年代我在苏北农村当知青时，曾参加地方政府因海岸线的东移而组织的修筑新海堤工程，当时所围之滩涂都是“潮上带”。在我们所筑新堤的西面，有近代我祖父他们修筑的“张公堤”；再向西，还有宋代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句的范仲淹主持兴建的“范公堤”。当年我在新海堤上曾浮想联翩：我所站立之处，不仅是海陆之交，也是天人之际；“范公堤”、“张公堤”以及我们所筑新海堤，就像黄海之滨一道道巨大“年轮”，标记着苏北沿海一次又一次的沧桑之变，标记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奋斗史；我瞭望堤外那茫茫一大片延伸到天际的滩涂，憧憬着把它们都变成祖国的良田，向往着黄海之滨能经过我们的努力再增添一道更壮丽的“年轮”。我从那时起就开始留心近代通海垦牧公司及苏北盐垦事业的发展历史，后来又扩展为江苏沿海经济发展史的研究计划。当我在大学读书读到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名句时，心里曾激起强烈的“共鸣”。我在经济史探索中主张在多样化发展中注重历史连续性，主张对现实生活中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做历史的追溯，在近现代史探索中强调现代化史观，这思想根苗都来源于父亲的教导以及当年我自己在黄海之滨的“悟道”。

1982年，我本来想考其他专业的研究生，但是由于前几年曾留心苏北盐垦事业的发展史，又读了吴承明先生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和其他老一辈学者所撰写的有关中国经济史的论著，就下决心改考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吴承明老师门下的经济史专业研究生。那年考研我过了笔试关却受挫于面试。^①为了排解受挫的郁闷，我与几位同学一起去普陀山旅游，没想到因此写就我的第一份经济调查报告。我们将返程时遇台风封岛，不得不滞留在普陀山。滞留期间我发现一位

① 我自己回想可能是吴老师不满我对其中两个问题的答复。吴老师问我“有没有通读二十四史”，我直截了当回答“没有”；又问我如何评价“亚细亚生产方式”，我答曰：“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提出的，但他自己后来也不用了，我对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感兴趣，我的兴趣在近代。”

前两天曾交谈过的普济寺僧人在小饭馆里吃肉丝面，我笑他为“当代济公”。他却答曰“和尚是人不是神”，并说普济寺也要搞改革，又对我讲了普济寺这几十年的一些变化，还主动告诉我改革后他的经济收入增加情况。受到他的启发，我在岛上到处找其他僧人询问他们各自的收支情况。尽管遭到一些僧人白眼，我还是调查到一些实情：改革开放前普陀山僧人经济上主要依靠佛教协会（实际上是国家财政）定期补助，改革开放后寺庙增加了其他的经济来源，僧人收入都有所增加；然而与当时“世俗”社会企事业单位相似，同一寺庙内僧人们收入大致平均，不同寺庙间僧人收入差距较大；普陀山还有在山腰结庐独修的僧人，其生活在改革后仍然主要依靠佛教协会补助，没有其他“外快”。据此我写成一普陀山僧人经济收入调查报告，因为其中也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后及改革前后的比较，也可以算是我最早的一篇经济史习作。此稿曾誊写两份，连原稿先后投过三家杂志社，但都无回音。

1983年，我再次报考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经济史专业的研究生，结果被调剂到南开大学经济所参加面试，过关后即在南开就读。我的硕士生导师聂宝璋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我们在南开的基础课学习主要由刘佛丁老师关照，而专业课学习则由聂宝璋、刘佛丁负责。在南开学习期间，聂先生一再要求我们精读严中平、吴承明和汪敬虞先生等前辈学者所撰写经济史论著，并要求我通读《筹办夷务始末》^①，他请北京经济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前身）瞿宁武先生给我们讲外国经济史课，而瞿先生每次讲完课都要开列一大堆书（包括英文原著）要我们读。聂先生还介绍我到上海拜访郑友揆先生。郑先生对我说做近代经济史研究一定要弄清金银比价和银钱比价变化。郑先生推荐必读之书方式别具一格，他不推荐书而是推荐作者，他要我把H.B.Morse写的书，不管有没有译成中文，都找来读。聂先生要求我们每周从天津到北京选修吴承明等先生开设的“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课程。对吴老讲的第一课，我印

^① 当时我对通读《筹办夷务始末》有抵触情绪，后来才意识到先生的良苦用心：要研究清后期统治阶层对千古变局的不同认识和应对，《筹办夷务始末》是必读的珍贵史料。

象较深的是关于“时间上广义”和“空间上广义”的阐述，结合严老讲的“破四就”（即不要就中国论中国，不要就近代论近代，不要就经济论经济，不要就事论事），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吴老讲课时多次强调要尽可能用计量方法，他同时也告诫学计量研究是一项小心谨慎、刻苦用功的工作，统计是经济史计量研究的基础。

当时赞扬农村承包制改革渐成学界主流，经济史界也有人在跟风歌颂小农经济，而我却认为小农经济并非农业现代化正途，又认为“匹夫有责”，试写了两篇论文，因怕老师骂（我感觉当时老师要求我们“厚积”而不急于“薄发”），我用的是笔名，也不敢让同学知道，但这两篇用地下工作方式写的论文投稿后也都无回音。当时国内热议“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天津人（包括我在南开的师友们）则期待“引滦入津”。我到处搜寻相关资料，研究结果认为调水得不偿失，不如迁厂迁人，必要的话应当迁都，镇江可以作为中国的经济都城。我曾上书国务院汇报这一研究结果，也无回音。

在我攻读博士生阶段，我的导师张国辉和吴承明、汪敬虞先生组成我的博士生导师小组，我曾总结这三位老师治学特点为：张老忌“满”（人不要自满，话不要说满）、吴老求“新”、汪老讲“透”。他们在我的博士生课程学习和论文写作等方面给予教导，使我终生受益。三位老师都主张经济史专业的博士生专业基础课应当精读一些经济学名著：张老推荐读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汪老推荐读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并且希望阅读时要注意几种版本的比较；吴老则推荐读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读了三位老师推荐的名著，又分别和三位老师一起讨论，受益很大。我向吴老汇报近代经济史专业课学习心得时，吴老建议我以后在近代经济史计量研究方面多努力。根据吴老建议，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主要在近代经济史计量研究范围内，再做具体选择时我选了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但是吴老不赞成我选近代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他认为国际收支研究涉及面广，难做；认为我对旧中国海关关册较熟悉，硕士论文又是做近代天津口岸与华北对外贸易的，建议我继续选口岸与外贸的题目。汪敬虞、彭泽益、聂宝璋先生也不赞成我的选题。我在张老支持下还是把博士论文选题定为“1895—1930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论文临答辩时，因为有

四位先生都曾不赞成我的选题，而且论文中一些观点与吴老不同，我心里很紧张，特别怕过不了吴老这一关。答辩时吴老说：“近代中国国际收支早就应该研究，但一直没人做，现在陈争平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吴老这番话被我牢牢记住，听了吴老的话我心里感到有底气了，很感激吴老的及时鼓励。吴老也问了一些问题，并建议我把研究对象下限延至1936年。会后，我即按照吴老及其他老师的建议，把原论文稿增改为《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一书。此书于2000年获中国社科院第三届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我在博士生毕业后参加了汪敬虞老师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领导要求我除了写好自己的一章外，还要协助汪老做好全课题组协调工作。但实际情况是汪老不仅教我写文章，还手把手地教我审改文章，使我受益极大。等到我们这一项目研究工作结束后，吴老即召我谈，要求我集中精力拿出一部自己的“金字塔式著作”流传后世。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金字塔式著作”，觉得高不可攀，有些惶恐。吴老则在《经济研究》发表书评把汪老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称之为“金字塔式著作”，因为汪老主编的这部书是我参与并协助汪老编写的，所以我对“金字塔式著作”也不感到高不可攀了。从吴老提议出发，我筹划了一个最终成果包括两库一丛书的中国长期经济统计研究大项目，这一计划正在进行中，如能完成可以为中国经济史学的计量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可实现吴老关于“金字塔式著作”流传后世的期望。同时我还结合外贸史与广义货币史的研究，及现代化理论探讨，并着手撰写江苏沿海经济发展史专著。按汪老要求，我还参加了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若干经济史重点研究项目团队工作。

本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中外经济关系史研究”所收论文中的《1895—193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值的修正及贸易平衡分析》、《1912—1936年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考略》、《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条件刍议》、《1895—1930年中国国际收支发展趋势及主要特征》、《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与近代化中的资金供给》、《民初盐务改革及洋会办丁恩》等六篇，主要内容都是我在攻读研究生阶段拟就，以后修改发表。《不平等条约下近代关税制度的形成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清代货币战争刍议》则是近几年写成，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中外经济关系史其他有关问题。第二编“企业、企业家及工商社团研究”中《从“大生”模式看张謇在企业制度方面的历史贡献》、《张謇与中国近代两次经济立法高潮》、《试论清末民初中国产业民营化的两条途径》、《近代苏北盐垦事业与农村社会组织创新》等集中讨论近代著名企业家张謇在发展民族经济方面的历史贡献，及张謇所创大生企业集团的发展历史；《近代工商社团的经济管理功能及其现实意义》主要讨论中国近代工商社团的历史作用及现实意义。第三编“经济史研究概论”中除《天津与南通：近代中国港城发展的两类典型》是我研究生阶段的旧作外，其余都是近几年写成，都与我在清华大学给研究生讲课内容有关。《经济史研究若干基本问题探讨》是在答清华大学研究生问基础上整理而成。《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白银时代”的组织调整》、《近代中国货币、物价与GDP估算》、《近代中国手织业的三次抗争》、《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对北方市场的影响》等则是研究生们感兴趣的一些专题。2011年上半年我再次上书国务院，就耕地红线等问题提建议。《新世纪农业现代化新路径探讨》、《东方尼德兰——中国现代化新增长点》是在其中两个建议基础上写成，曾分别在中科院第9、10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等学术会议上发表。本来欲将《近世中国广义货币刍议》、《新世纪经济史学：在多样化发展中注重历史连续性》等论文列入，因篇幅限制而割舍。

陈争平

2012年8月于清华园

目 录

第一编 中外经济关系史研究

- 1895—1936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值的修正及贸易平衡分析 3
- 1912—1936 年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考略 31
- 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条件刍议 40
- 1895—1930 年中国国际收支发展趋势及主要特征 52
- 1895—1936 年中国国际收支与近代化中的资金供给 69
- 不平等条约下近代关税制度的形成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85
- 民初盐务改革及洋会办丁恩 101
- 清代货币战争刍议 124

第二编 企业、企业家及工商社团研究

- 从“大生”模式看张謇在企业制度方面的历史贡献 135
- 张謇与中国近代两次经济立法高潮 160
- 试论清末民初中国产业民营化的两条途径
——以盛宣怀、张謇的企业活动为案例 171
- 近代苏北盐垦事业与农村社会组织创新 189
- 近代工商社团的经济管理功能及其现实意义 201

第三编 经济史研究概论

- 经济史研究若干基本问题探讨 215
- 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白银时代”的组织调整 226
- 新世纪农业现代化新路径探讨 247
- 天津与南通：近代中国港城发展的两类典型 257
- 近代中国货币、物价与 GDP 估算 266
- 东方尼德兰
——中国现代化新增长点 273
- 近代中国手织业的三次抗争 281
- 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对北方市场的影响 290

第一编 中外经济关系史研究

1895—1936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值的修正 及贸易平衡分析

进出口贸易值的准确程度对中外经济关系研究的影响极大。1895—1936 年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关于这一时期中国进出口贸易值，不少论著往往直接引用海关《关册》的统计。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关册》的统计值提出质疑，比如郑友揆先生就曾认为，由于种种缘故“以致关册上所载之进出口值，与实际之贸易值相差甚远”^①。因此，哲美森（G.Jamieson）、雷麦（G.F.Remer）、郑友揆、姚贤镐、肖梁林等中外学者都曾对近代中国海关《关册》某些年份进出口值作了修正。但由于各人所用修正方法不同，他们所得之值彼此差异也很大。^②本文作者根据多方面的资料，比较了各家所用方法，对其中合理的加以推广，对其不足之处加以修改、补充。本文对 1895—1936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修正，以期有助于进一步开展这一时期中外经济关系史的研究。

一、海关的统计

为慎重起见，我们应该先对这一时期中国海关贸易统计记载方法作一历史考察。

（一）海关贸易统计记值方法

1904 年以前海关当局单纯从税收意义上来统计记载进出口贸易

① 郑友揆：《我国近十年贸易平衡之研究》，《社会科学杂志》6 卷，1935 年 4 期。

② 详见陈争平博士学位论文《1895—1930 年中国国际收支问题初探》，第二章，附录。